

美国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海明威研究^{*}

杨仁敬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评介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美国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对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批评研究。海明威从在巴黎登上文坛便成了评论界关注的中心。有的将他看作自然主义作家，有的认为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有的则认为他受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影响。后来，新批评派、历史文化派、多元文化派、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以及生态批评家都对海明威进行了评论。传记批评从他去世后不久开始，至今历久不衰。

关键词 美国 文学批评 语境 海明威研究

从 1924 年 10 月纽约《日晷》杂志评介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至 1961 年 9 月《生活》杂志连载《危险的夏天》，海明威还在世时，他的作品就一直受到美国知名作家和批评家的密切关注。诚如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文学）批评在海明威创作生涯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许没有一个美国天才作家像海明威这样受到公众关注而不断发展：他比我们时代的任何作家都受到更多的注视、关切、检验、预估、怀疑和警告。”美国文学批评对海明威的成才和成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 50 年代初，卡洛斯·贝克的专著《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外国名作家学术史》的分课题《海明威学术史》的研究成果。
Jeffrey Meyers, ed., *Hemingway: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82, 1997) 6

(1952) 揭开了系统研究海明威的序幕, 同时也出现了约翰·麦卡弗里编的《海明威其人其作》(1950)、菲力普·扬的《海明威》(1952) 和查尔斯·芬顿的《海明威的学徒阶段》(1954) 等论著编著以及哈里·列文发表于《肯庸评论》的论文《海明威风格面面观》(1951)。在此之前对海明威作品的报刊评论不少, 但专著不多, 研究范围也不够宽。对海明威感兴趣的学者屈指可数。

1961年7月, 海明威去世, 不久, 各种回忆录相继问世, 如海明威弟弟莱斯顿的《我的哥哥海明威》(1961)、莉莉安·罗丝的《海明威画像》(1961)、海明威姐姐玛士琳·珊福德的《在海明威家里: 家庭素描》(1962)、霍茨纳的《“爸爸”海明威》(1966)、康斯坦丝·蒙哥马利的《海明威在密执安》(1966) 等。这些回忆录从不同角度回顾了海明威的生平创作, 丰富了海明威的形象。

与此同时, 美国学者开始梳理归纳海明威生前的报刊评论。如卡洛斯·贝克编的《海明威与他的批评家》(1961) 和《海明威四大小说评论集》(1962)、罗伯特·威克斯编的《海明威评论选》(1962)、罗格·阿斯林诺编的《海明威在欧洲的文学声誉》(1965) 等。

不仅如此, 一些研究专著也陆续出版, 如约瑟夫·德法尔科的《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英雄》(1963)、罗伯特·路易斯的《海明威论爱情》(1965)、约翰·基林格的《海明威与死神们: 存在主义研究》(1965)、菲力普·扬的《重估海明威》(1966)、谢里登·贝克的《海明威评释》(1967)、罗伯特·斯蒂芬斯的《海明威的非小说》(1968)、列奥·葛科的《海明威对英雄主义的追求》(1968)、理查德·何维的《海明威的心境》(1968)、尼古拉斯·胡斯特的《海明威与小杂志》(1968)、约翰·豪威尔的《海明威的非洲故事》(1969) 和戴尔伯特·威尔德的《海明威的英雄们》(1969) 等。这些专著涉及海明威的小说、非小说、他对英雄主义的追求以及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对他的影响等, 有些研究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除了上述专著外, 一些知名学者的论著也专章或专节评述海明威和他的作品, 主要有莱斯利·菲德勒的《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1960) 和丹尼尔·艾伦的《左翼作家们》(1961), 一些重要报刊也刊登了研究海明威的大量学术论文。有趣的是在上述专著和论文中, 研究者用历史文化批评、心理分析批评、新批评理论来剖析海明威的小说, 其中“准则英雄”论和“创伤论”曾影响了相当长时间。

到了70年代, 海明威受到女权主义批评家的尖锐批评。在苏尼坦·杰恩的

《女人与母狗：海明威两个女主人公无罪》（1972）和安娜·格列科的《玛格丽特·麦康伯：坏女神无罪》（1975）中，两位女作者批评海明威对女性冷淡，抱有偏见。但帕米拉·法泽在《形式与功能：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妇女形象》（1974）中则提出要公正地评价海明威笔下的妇女形象。威廉·斯帕福德在《超越女权主义观点：永别了，武器 中的爱情》（1978）中为海明威辩护，认为应该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待海明威对女性的描写。

在争论中，《永别了，武器》尤受重视，因此，一些评论集和专著应运而生，如杰伊·基林斯编的《20世纪的解读：永别了，武器 评论选》（1970）、约翰·格拉汉姆编的《永别了，武器 研究论文集》（1971）、麦克尔·雷诺茨的《海明威的第一次战争：永别了，武器 的创作》（1976）、伯纳德·欧德西的《海明威的含蓄技巧：永别了，武器 的写作》（1979）等。以往评论又受到重视，涌现了阿瑟·瓦尔霍恩编的《海明威评论选》（1973）、琳达·威尔西默·瓦格纳编的《海明威 50年评论选》（1974）、奥德·汉尼曼莱在先前编的《海明威参考书目总览》（1967）基础上又编的续编（1975）、罗伯特·斯蒂芬斯编的《海明威的批评接受》（1977）和威格纳编的《海明威参考书目导读》（1977）。

有关海明威的回忆录和传记继续出版，如海明威母亲格拉斯·海明威写的《传统：为了我的孩子们》（1974）、他的妹妹玛德琳娜·密勒写的《欧尼》（1975）、他的妻子玛丽写的《怎么回事？》（1977）、他的儿子格里戈利写的《回忆我的爸爸》（1977）、艾丽丝·汉特·苏科洛夫的《海明威第一任妻子哈德莱传》（1973）、詹姆斯·麦克林敦的《海明威在基韦斯特》（1972）和理查德·奥孔纳德的《海明威传》（1971）以及海明威的前妻玛莎的《我和他的旅行记》（1978）。海明威的朋友、西班牙作家霍雪·路易斯·卡斯蒂洛·布希写的《海明威在西班牙》（1974）如实描述了他与海明威的友谊和海明威在西班牙的活动。这本书开启了“海明威在海外”研究的先河。斯各特·唐纳尔逊的《意志的力量：海明威的生活与艺术》（1977）则论述了海明威的人生观、金钱观、写作观、爱情观和世界观，以及海明威怎样将他的生活经历写进小说。劳埃德·阿诺德的《海明威高高地站在荒野》（影集，1977）则提供了许多海明威在爱达荷州的生动照片。彼特·巴克莱也编了《海明威画册》（1978）。

海明威的小说艺术吸引了众多美国学者，这成了 70年代海明威研究一大特色。主要论著有艾米莉·斯泰帕斯·瓦特斯的《海明威与艺术》（1971）、查曼·纳哈尔的《海明威小说的叙事模式》（1971）、谢尔登·诺曼·格列斯坦的

《海明威的技巧》(1973)、劳伦斯·布鲁尔的《海明威的西班牙悲剧》(1973)、安东尼·伯杰斯的《海明威和他的世界》(1978)和雷蒙·纳尔森的《表现主义艺术家海明威》(1979)等。

另一些学者则致力普及海明威作品。阿瑟·华尔德宏的《海明威导读》(1972)比以前马尔科姆·考利编的《维京海明威袖珍读本》(1944)和查尔斯·普尔编的《海明威读本》(1953)更受欢迎。布鲁克·沃克曼的《追寻海明威》(1979)则详细评介了在高中海明威讨论课的教学方法。

80年代,海明威研究掀起了新热潮。研究资料进一步充实。詹姆斯·布拉斯茨和约瑟夫·西格曼合编了《海明威综合资料考》(1981),精心汇集了美国各图书馆7700本有关海明威的书,附有60页的精彩导言和综合索引。肯尼迪图书馆海明威藏书部出版了权威完整的《海明威目录索引》(1982)。威廉·怀特则编了《海明威研究最新目录》(1981-1982)。查尔斯·奥里弗编了《海明威注释》(1979-1981)和《海明威评论》(1981-1992)。杰弗莱·梅耶斯编的《海明威的批评遗产》(1982)收入118篇报刊评论和4篇悼念文章。此外,还有罗伯特·李编的《海明威新批评论文集》(1983),它收了10篇新评论,其中有7篇是英国学者写的,反映了英国学术界的海明威研究。詹姆斯·纳格尔编的《批评语境中的作家海明威》(1984)则汇集1982年波士顿海明威国际会议的12篇论文。拉里·菲力普斯编了《海明威论写作》(1984),系统收集了散见于海明威作品和书信中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等问题的看法。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传记批评的繁荣和发展。五种海明威新传记接连问世,它们是杰弗莱·梅耶斯的《海明威传》(1985)、彼特·格里芬的海明威传记第一部《海明威的早年生活》(1985)、厄尔·罗威特和吉里·布兰纳合写的《海明威传》(1986)、肯尼思·林恩的《海明威传》(1987)和迈克尔·雷诺兹五卷本的海明威传的第一卷《青年时代的海明威》(1986)和第二卷《海明威的巴黎岁月》(1989)。凯恩·法列尔的《海明威寻找勇气》(1984)则为青年读者介绍了海明威的成才之路。一些回忆录又陆续出现,如杰克·海明威的《一个机灵渔民的不幸遭遇》(1986)。霍茨纳的《回忆“爸爸”海明威》加上副标题“快乐与忧愁”修订出版(1983年)。它回忆了海明威最后14年的生活及其与作者的忘年之交。古巴学者诺伯特·富恩特斯出版了《海明威在古巴》(1984),评介了海明威在古巴22年的生活,探讨了他小说中的古巴元素与瞭望田庄的始末。他还编辑出版了影集《重新发现海明威》(1988)。

随着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批评理论的兴盛，海明威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新成果。伯尼斯·克特获普利策奖的作品的《海明威的女人们》（1983）以玛莎为中心，集中探讨了海明威与母亲、前三任妻子和几个女友的关系和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格利戈里·格林的《海明威对种族偏见的批评》（1981）回顾了海明威青年时代与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和平相处，他在小说中描绘他们可爱的性格，有力地批评种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华特·威廉斯的《海明威的悲剧艺术》（1981）指出海明威小说的发展与他的悲剧意识的强化是相呼应的。吉利·布南纳的《海明威作品中的隐藏手段》（1983）深入评析了海明威隐藏的艺术美学和小说试验中的含蓄技巧以及“爸爸”的定位。约翰·里伯恩的《荣誉成就了海明威》（1984）罗列了海明威对批评家及其评价的反应。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编辑出版了《欧内斯特·海明威》（1985）。马修·布拉科利编的《与海明威对话》（1986）收集了海明威多次与记者的回答，很有参考价值。罗伯特·斯科尔斯的《解读爸爸》（1987）从文本解读的视角评价了海明威其人其作。苏珊·比格斯的《海明威的省略技巧》（1988）和《海明威被遗忘的短篇小说》（1989）颇受学术界重视。霍茨纳 1989年又推出了新作《海明威和他的世界》。

此外，学术界注意到海明威对电影的兴趣和他许多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变化，如吉恩·菲利普斯的《海明威与电影》（1980）。弗兰克·劳伦斯的《海明威与影片》（1987）则详细比较了海明威小说与其改编的影片的差异。对海明威四大小说的逐一评论陆续涌现，如弗列德里克·约瑟夫·斯沃波达的《海明威与太阳照常升起》（1983）和约瑟夫·弗洛拉的《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的故事》（1982）。弗洛拉认为亚当斯的26篇故事说明他不是“受伤”的英雄，而是一位精神康复的主人公。还有雷诺兹的《太阳照常升起：一部20世纪的长篇小说》（1988）、丹尼斯·布莱恩的《真正的绅士：海明威熟人对他的描述》（1988）和保尔·史密斯的《海明威短篇小说导读》（1989）等。

90年代，海明威传记批评仍有所发展。迈克尔·雷诺兹继续完成五卷本海明威传的其他三本：《海明威从欧洲回国》（1992）、《海明威在30年代》（1997）和《海明威的最后岁月》（1999）。作者用历史文化主义的视角审视了海明威的生平和创作。比特·格里芬发表了海明威传第二卷《决不背信：海明威在巴黎》（1990），詹姆斯·梅尔洛的《海明威：没有结果的生活》（1992）揭示了海明威性格和作品中鲜为人知的缺陷。查尔斯·怀庭的《海明威在欧洲：1944 - 45》（1990）、罗伯特·路易斯编的《海明威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论文集》（1990）、

彼得·梅森特的《海明威传》(1992)、斯图亚特·麦克尔维的《海明威的基韦斯特》(1993)和罗立森的两本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玛莎的传记《勇者不出事》(1990)和《美丽的流放者：玛莎·盖尔虹传》(2001)，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海明威其人其作的概貌。吉欧依亚·狄里伯托写了《哈德莱传》(1992)，描写了哈德莱早年与海明威的共同生活和她对他的影响。杨仁敬写了《海明威在中国》(1990)，评述了1941年海明威和玛莎中国之行的始末。马修·布拉科利《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危险的友谊》(1994)回顾了两位小说家交往的历程。他还编了一本《海明威与麦克斯威尔通讯录：1925 - 1947》(1996)，反映了海明威与他的出版商来往的记录。詹姆斯·普拉思和弗朗克·西蒙斯合写了《回忆海明威》(1999)，收集了多位海明威朋友对他的回忆和怀念。

克利·拉森编的《海明威参考书导读：1974 - 1989》(1990)、琳达·威格纳·马丁编的《海明威70年评论选》(1998)和查尔斯·奥立弗的《海明威批评词典：一部他的生活和创作的文学参考书》(1999)重新梳理了对海明威70年来的评论。罗伯特·特洛敦编的《海明威文献集》(1999)汇集了许多重要历史文献，为年轻一代研究海明威提供了方便。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弗列德里克·伏斯著、雷诺兹作序的影集《描绘海明威：一个作家在他的时代》(1999)，以参加纪念海明威诞辰一百周年在华盛顿举办的全国影像展览(1999年6月18日至10月3日)。

在研究方面，性别理论、后现代主义、尤其是生态文学批评的影响更加明显。除了杰米·巴洛的《海明威的性别理论》(1992)外，马克·斯皮尔克的《海明威对男子女性化的挑剔》(1990)质疑了五六十年代盛行的“准则英雄”和“创伤理论”，特别是南希·康姆雷和罗伯特·斯科尔斯合著的《海明威的性别：重读海明威文本》(1994)尤为突出，它详细剖析了海明威在小说中对男性和女性的描写。另外还有戴伯拉·莫德默的《重建海明威的身份：性政治、作家与多元文化教室》(1993)和许多论文，如《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女人与男人、爱情与友谊》、《太阳照常升起和在我们的时代里对男性的戏剧化》和《白象似的群山中性别联系的误导》等。黛博拉·英格列默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非洲的重置：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经济的交叉和海明威传记》(1998)考察了海明威这个短篇小说所揭示的非洲后殖民主义的余毒。

刚兴起不久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很快受到美国学者的重视，并应用于海明威研究。“海明威与自然界”成了1996年在克茨姆召开的第九届海明威国际会议的

主题。会后，由罗伯特·弗莱明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就取名为《海明威与自然界》（1999）。《海明威评论》主编苏珊·比格尔写了两篇重要文章：《第二次成长：海明威父与子中生态的丧失》（1998）和《心与眼：海明威所接受的大自然教育》。接着又涌现了一系列生态批评的论文，如《老人与海中的生态意识》、《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生态环境》、《大二心河里的生态意象》、《印第安人——海明威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海明威与爱达荷的地域情缘》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大自然、妇女和神话》等。

有的学者试用结构主义批评来阐释海明威的作品。如奥德瓦·何尔麦斯兰德的《结构主义解读：海明威的雨中的猫》（1990），但为数不多。许多美国学者认为结构主义批评并不适于评析海明威的作品。

90年代研究海明威的专著编著十分兴盛，如卡尔·布列德尔和苏珊·德拉克的《作为叙事发展技巧的非洲的青山》（1990）、司各特·唐纳尔逊编的《永别了，武器新论文集》（1990）、杰克逊·班森编的《海明威短篇小说的新批评方法》（1990）、杰奎琳·塔弗尼尔·库宾的《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神话制造者》（1991）、吉里·布南纳的《老人与海：一个普通人的故事》（1991）、罗伯特·路易斯编的《永别了，武器：词汇之战》（1991）、弗兰克·斯卡菲拉编的《重评海明威论文集》（1991）、温多林·特妥罗的《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的抒情维度》（1992）、沃尔夫冈的《太阳照常升起 的悲喜剧因素》（1991）和《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叙事中隐藏的神》（1992）、里纳·山德森编的《炸桥：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论文集》（1992）、艾伦·约瑟夫的《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未发现的国家》（1994）、詹姆斯·纳格尔编的《太阳照常升起论文集》（1995）、弗兰克·凯尔的《海明威与后叙事条件：太阳照常升起非权威评论》（1995）、哈罗德·布鲁姆的《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评论集》（1996）、《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评论集》（1996）和《海明威老人与海评论集》（1996）等。

另外卡思林·摩根的《海明威与荷马的见证叙事》（1990）、马克·西蒙斯的《圣地亚哥：两个世界的圣人》（1991）、吉拉尔德·肯尼迪的《巴黎想象：流亡、写作和美国身份》（1993）、哈雷·奥伯赫尔曼德《海明威在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中的出现》（1994）、罗伯特·弗莱明的《镜中脸：海明威的作家们》（1994）、米里尔姆·曼德尔的《阅读海明威：小说中的事实》（1995）、罗丝·玛丽·伯威尔的《海明威：战后年代与遗作》（1996）、唐纳

德·比泽的《美国流亡者的写作与巴黎时期：现代主义与地方》（1996）、詹姆斯·纳格尔的《海明威：橡树园的遗产》（1996）、巴巴拉·奥尔森的《20世纪权威人物：伍尔夫、海明威及其他作家的无限叙事》（1997）和罗伯特·特劳敦编的《海明威：一部文学参考书》（1999）等这些论著多角度多层次解读海明威早年在巴黎的生活和创作，他与其他作家的关系，他的不朽名著《老人与海》以及他的遗作。不论何时何地，美国学者总想用各种文学批评理论来重新评价和阐释海明威其人其作，给20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批评遗产。

二

进入新世纪，海明威像以前一样，仍是美国文学批评关注的中心之一。2000年美国出版了四本颇有分量的专著：第一本是琳达·威格纳-马丁编著的《海明威的历史导读》。它收集了七篇重要论文，从当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语境探讨海明威的性别规训、青少年时代在自然界的磨炼与父母的启导和身教、他小说中的重大主题：爱情与战争、友谊与失落以及作品中的互文性。书中有雷诺兹写的海明威小传和附有图片的文化大事编年记，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相对应。

第二本是杰弗莱·梅耶斯的《海明威：融生活于艺术》（2000）。这是他对以前写的《海明威传》（1985）的补充。此书以丰富的资料探讨了海明威生活和作品常被忽略的方方面面，如联邦调查局对海明威的严密监视、海明威与电影明星波加特和库柏的友谊、他对战争的描写、他与西班牙斗牛士的交往、他的公共形象的变化、他的神话为何越传越广以及对《丧钟为谁而鸣》、《过河入林》和一些著名短篇小说的评论。此书问世后受到各大报刊的好评。

第三本是科克·寇纳特的《海明威与美国流亡人士的现代主义运动》。巴黎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聚集了一群英美青年作家。作者详尽评述了他们与现代主义运动的关系、现代主义从绘画、音乐到小说的发展及其特色。海明威如何将先锋派的艺术手法融入自己的作品，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什么他能在短短六年间从巴黎迅速崛起，成为美国文坛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指出：“因为他是这个文学运动的一部分。”该书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大格局来审视海明威的成才之道，颇有新见地。

第四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是迈克尔·雷诺兹的《海明威传》（单卷本）。作者以全新的结构和思路来展示海明威作品的特色与生活的变迁，包括海明威生平简介、创作分期、他的成名和艺术技巧、他的遗作、批评界的接受和影响、他的

文艺观和海明威研究中的问题等等。虽通俗易懂，仍不乏真知灼见。作者特别指出，海明威临终前几年曾用心研读青年作家的小说，如欧文·肖的《幼狮》（1948）、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等。他关心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困境。雷诺兹认为从1946年到1960年，海明威的作品如《流动的盛宴》和《危险的夏天》，都打破了体裁的界限。海明威的后现代派作品，比著名的后现代派小说家约翰·巴思要早得多。如长篇小说《曙光示真》是他未写完的“小说回忆录”，以他1953年的非洲狩猎经历为基础，与虚构相结合，既描绘了他打金钱豹和妻子玛丽打狮子的经历，又有虚构的叙事者讲述狩猎故事，同时穿插有关宗教、婚姻和叙事者早年生活的议论以及身处逆境求生的谋略。这种“跨体裁”的写法说明海明威的创作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

随后又出现了一些传记和专著，如《玛莎：20世纪的一生》（2003）、罗伯特·加兹达斯基的《海明威在他自己的国家》（2007）等。前者是玛莎传记，有专章反映她与海明威从相识到相爱的经历和共同生活了五年后分手的过程；后者是加兹达斯基的海明威论文集，收入26篇论文，从最早评海明威的《春潮》到他的遗作《伊甸园》的阐释，其中有几篇评《永别了，武器》的文章尤其引人注目。2006年杨仁敬出版了《海明威在中国》增订本，充实了许多新资料。同年，曾在香港和韩国担任《南华早报》记者的美国作家彼特·莫列拉发表了《海明威在中国前线》（2006），揭示了海明威和玛莎受美国政府之命到中国和东南亚收集抗日战争的情报以及两人从结缘到分手的过程。2007年，琳达·威格纳-马丁出版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文学传记》（2007），这是美国学者写的最新传记。

三

成名前，海明威得到了已成名的作家庞德、安德森、斯坦因、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和英国小说家乔伊斯、福特以及美国批评家威尔逊等人的支持和帮助。斯坦因欣赏他诗中的抒情性，建议他往诗歌方向发展。远在纽约的威尔逊则发现他散文中的独特气质，认为他最好继续写小说，将来必有所成。海明威的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和《在我们的时代》问世后，有人赞扬它们是现实主义的，有人则认为它们是自然主义的，“比照相机还精确”。菲茨杰拉德具体帮他修改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使他一举成名。

J. E. Kobler, *Ernest Hemingway: Journalist and Artist*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68).

海明威一直主动参与访谈与文学评论，这也许是美国海明威研究中的一大特色。成名后的海明威对评述自己的作品很感兴趣，在 1946 - 1959 年间先后共十多次口头或书面回答报刊记者的提问。他自己是记者出身，乐于与他们接触，畅谈他的作品、人物、风格和他的阅读等等。但他对批评他的人往往很反感，甚至勃然大怒，如 1923 年他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读到威恩汉姆·利维斯批评他的文章时大发脾气，随手拿起老板西尔维亚办公桌上的郁金香花瓶砸在地上。1935 年，伊斯特曼批评他写西班牙斗牛赛不准确，海明威在纽约斯克莱纳出版社帕金斯总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火冒三丈，两人大打出手。海明威早就写了小说《春潮》，嘲弄曾举荐过他的安德森的小说《黑色的笑声》，虽然第一任妻子哈德莱再三劝他不要这么做，他还是一意孤行，坚持发表。他在《流动的盛宴》中批评早年帮助过他的斯坦因和安德森等人，使学术界对他颇有微词。后期他与批评家的关系颇有改善。他阅读卡洛斯·贝克的专著《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手稿时，不同意书中关于象征主义的评述，每处都打个问号，但贝克坚持己见。该书出版后，两人仍是好朋友。

海明威一度成为众多文论批评的中心。但美国文论流派繁多，莫衷一是。各个流派都想用对海明威的评论增加自己的实力。有的解读有理有据，颇有新意；有的则牵强附会，令人难以苟同。总的来说，新批评理论的分析较多，涉及的范围较广，论著甚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有一些，但偏重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结构主义阐释比较少，许多学者不能接受。历史文化批评的论著也很多，影响甚为深远。生态文学批评的应用则充满活力，前途无量。传记批评常有新作问世，历久不衰。

综上所述，虽然在美国文学批评语境中，海明威的声誉也经历过不同时期的起伏变化，但他作为一位现代美国的主要小说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作者简介] 杨仁敬，1937年生，厦门大学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海明威在中国》（1990，增订本 2006）、《20世纪美国文学史》（2000）、《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2005）等。

责任编辑：刘雪岚